

“新山乡巨变”背景下新世纪吉林乡土小说创作论——以王怀宇、刘庆为研究对象

李松霖¹, 王晓恒^{1*}

(1.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130032;

* 通讯作者, wangxiaoheng@126.com)

摘要: 新世纪吉林乡土小说扎根黑土地, 深入挖掘本土历史资源, 将草原文化与农村变迁融入作品中, 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 其中王怀宇和刘庆的作品极具代表性。本文在“新山乡巨变”背景下, 解析王怀宇与刘庆的吉林乡土叙事, 首先通过乡土风景的本色呈现, 呈现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其次通过乡村新人的返乡与奋斗, 揭示乡村新人破解发展困境的路径, 最后通过乡土文化的现代转型, 彰显中华文化基因在变化中孕育新文明。两位作家以文化基因的重组与生态伦理的重建, 为乡土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兼具民族根性与人类价值的文学方案。

关键词: 新山乡巨变; 吉林乡土小说; 王怀宇; 刘庆

引言

新世纪吉林乡土小说创作以2022年8月“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以下简称‘新山乡巨变’)”启动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此前, 王怀宇、刘庆等作家虽单打独斗, 未形成固定群体, 但其聚焦生态伦理与族群命运的作品为吉林乡土小说奠定了基础。该计划启动后, 在国家政策支持和会议论坛推动下, 创作活力显著增强, 深刻影响了上述中生代作家, 也使得一些新锐作家崭露头角, 共同构成了吉林乡土小说创作的丰厚基础。本文在“新山乡巨变”背景下, 回望王怀宇和刘庆的东北乡土叙事, 发现二人的创作与“新山乡巨变”的创作主旨相契合, 他们以东北黑土地为样本, 为“新山乡巨变”提供了兼具地域特质与普遍意义的文学答卷。

1. 新时代乡土风景的本色呈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乡村的剧变伴随着自然景观的凋敝, 乡土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一度被边缘化。王干曾尖锐指出当下小说“风景缺失”的症候: 传统小说中风景本应承担情节铺陈、人物塑造及美学载体的功能, 而今却沦为“被遗忘的背景”[1]。这一现象深层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作家精神风景的荒芜, 在消费文化的裹挟下, 审美感知力的钝化导致“看不见风景”的集体困境。值得关注的是, 王怀宇与刘庆的创作逆流而上, 将乡村景观置于“新山乡巨变”书写的核心位置, 并通过两种对立性景观的并置, 揭示乡土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对生态的暴力侵蚀的复杂面貌与现代性转化过程中的家园重建。

王怀宇以近乎调查报告式的笔触, 记录东北黑土地的生态恶化, “海兰江畔金稻村原本泛着油光的黑土地越来越发灰、发黄, 甚至发白……有时, 连续数日的冒烟大风过后, 金稻村人连自家田地里种的是啥都辨认不出来了。黑土地就像被胡乱地蒙上了一床脏兮兮的破棉被, 原本翠绿挺拔的稻苗变得萎靡枯黄, 半死不活地倒伏在浑浊的泥水里。”[2]“眼瞅着白鹤村的绿色植被一天比一天稀少, 黑土地渐渐变成了白土地, 盐碱化程度一天比一天严重了。没风的天气还好一些, 只要大风刮起, 铺天盖地的白色盐碱末子就会随风飘扬, 一股咸滋滋的味道会持久地弥漫在空气中。”[3]“冒烟大风”“白色盐碱末”等意象构成触目惊心的生态面貌, 宣告了传统农耕文明与自然共生关系的断裂。《血色草原》中查干淖尔草原的消亡则更加具有系统性的悲剧色彩, 工作组以“促生产”之名对狼群、鱼群进行剿灭式屠杀, 导致草甸裸露、湖泊干涸。小说以“死一样寂静无声的无限苍凉”的塔头滩, 隐喻自然生态链崩解后的废墟状态。

面对这种生态创伤，王怀宇赋予其笔下人物以治愈之力。《风吹稻浪》中江春燕、郑大民引入有机水稻技术，构建“稻蟹鸭共生”的循环农业，使“白灰村”蜕变为稻浪翻涌的“白鹤村”。《芬芳大地》里赵二良以“良心稻子”为核心打造绿色品牌“金稻粳米”，使得黑土地的色彩从贫瘠的白色转换为了丰收的金色，“秸秆还田”“河湖连通工程”等现代科技与传统“黑土地盖被子”土法的融合，标志着盐碱地的治理开始向生态保护的方向转型。

乡土景观的重建更需要人文精神的浇灌。《风吹稻浪》中吕老倔书屋取代牛大翠麻将馆，意味着村民的精神文明随着乡土风貌的蜕变而进步。《芬芳大地》里赵二良救助“仇家”的父亲，瓦解了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逻辑，推动乡村风尚回归“良心底线”，吕文龙将农民画市场化、赵二良整合产业链的实践，都证明了“农业+文化+商业”的三产融合才是乡土可持续繁荣的根系。

同样，在《唇典》中，养鸡场的设立彻底恶化了洗马村的自然生态，溪水由清转黑，荷花塘沦为“鸡屎塘”，蚊虫肆虐引发了呼吸道疾病，村民只能被迫紧闭门窗，“养鸡场紧闭的大门下面有一条坡道，以便下雨天粪水自动排到溪水里去。黑色的溪水翻滚着污秽的泡沫。洗马村苍蝇乱飞，粘蝇纸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苍蝇。炎热的夏天，家家紧紧关上门窗，以减少臭气的影响。”[4]这些现象直接指出了粗放式产业对乡村自然伦理与社会关系的双重毒害，印证了人类肆意妄为终遭自然惩罚，具有浓厚的生态警示意味。

刘庆在《唇典》结尾提供了一种文化复活的可能路径，库雅拉河谷将萨满文化从“封建残余”重构为文旅资源，“……要把库雅拉河谷变成旅游示范区。要开发旅游就要开发文化……我们可以成批地制造腰铃、制造手鼓，可以进行萨满歌舞表演。”[4]这一设计虽然隐含着商业化的风险，却能使濒危的萨满文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重新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实现精神信仰的现代化转型。

王怀宇与刘庆的风景叙事，超越了王干所批判的“风景缺失症”，在美学层面重建了一种关于风景与时代精神的对话机制，乡土风景不仅是自然存在的镜像，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显影。

2. 新时代乡村人物的返乡与奋斗实践

在新时代“新山乡巨变”的书写浪潮中，乡村人物形象的塑造成为文学表达的核心命题。正如田振华所言，“新时代乡土小说的乡村人物书写，实际上就是呈现了这些新的乡村人物返乡、建乡与守乡的奋斗史，他们如何返乡、如何建乡又如何守乡，成为当代乡土作家重点书写的对象。”[5]此类人物需超越对现实的简单摹写，融合现实性、可能性与理想性，建构具有审美深度的文学典型。从社会学视角看，柳礼泉等学者基于对贫困农民主体性的多维度审视，提出的“精神贫困”理论框架，将农民主体划分为“内生力型”与“精神贫困型”两类[6]。这一分类在王怀宇《芬芳大地》与刘庆《唇典》的人物谱系中得以生动印证，其中以赵二良与满斗的返乡实践最具典型意义。

王怀宇笔下的赵二良，是“内生力型”新农民的典型代表。作为黑土地上农民的后代，他怀揣着农业技师与农民画家的双重理想，却在父辈传统观念的规训下被迫通过高考实现“阶层跃迁”，成为省城记者，但是都市生活的“体面”外衣无法掩盖他对认同的病态渴求、同质化生存的虚无感所引发的精神危机，进而深陷身份迷失导致的焦虑。而老叔的猝然离世成为其生命转折的催化剂，迫使他直面被遗弃的初心。最终，赵二良选择回归故土，通过引进有机水稻技术、以画笔记录农耕文明，实现“建乡”与“守乡”的双重使命。这一过程既是对个体精神家园的救赎，亦是对传统与现代文明冲突的主动调适，他以新技术反哺农业，以新审美重构乡村文化，彰显了内生动力驱动下的主体创造性。

与之相对，《芬芳大地》中李勇浩、马胜利等“精神贫困型”人物，因思想保守、价值观念滞后成为乡村变革的阻力。《风吹稻浪》中的吕文凤则深陷城乡夹缝，她在县城端盘谋生、坚持写作，却因经济困窘难以突破生存的困境。这类角色折射出离乡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无力感，反衬出“内生力型”主体精神自觉的珍贵性。

在《唇典》中，满斗作为“内生力型”的人物，其返乡历程充满伤痛与挣扎。他因追寻“花瓶姑娘”被土匪掳走离乡，又因跳伞事故重伤致残，失语痴傻地回到故乡，沦落到与牲畜争食的境地。此时他的身体虽归故土，灵魂却因战乱、瘟疫和工业入侵带来的剧变而自我流放。直到战乱平息、侵略者离开以后，他才真正实现精神上的回归。然而火柴厂、红蚂蚁公司对环境的破坏，宣告了满斗记忆中美好的故乡已经永远消失。满斗最终以“守乡人”身份在废墟中种下“灵魂树”，用这种孤独的坚守践行生态重建的理想。这个形象超越了普通建设者，他既是乡土创伤的承受者，又是精神复活的象征。满斗被迫归乡的身体与主动守乡的灵魂形成张力，构成对现代化暴力的深刻反思。

在新时代乡村变革的叙事中，赵二良与满斗分别展现了两种实践方向，赵二良作为“建乡者”，通过现代农业技术和人文情怀激活了乡村内生动力，将盐碱地转变为丰产良田；满斗作为“守乡人”，则以种植“灵魂树”的孤独坚守守护精神根脉，警示现代化进程中的代价。这两个形象共同构成新时代乡村新人的完整精神图谱，既有立足现实的实践根基，又蕴含超越性的理想光芒，深刻回应了“如何在发展中守护乡土文

明”的时代命题。他们的故事不仅为乡土文学注入新质，更为中国乡村复兴提供了兼具实践价值与精神启示的双重参照。

3. 新时代乡土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新山乡巨变”的历史语境中，乡村文化振兴被赋予核心地位。它既是乡土活力的外显，更是中华文明基因的存续载体。正如学者所言：“□对□个如此加速度巨变的新时代新农村，我们可能□□阻□时代巨变的□轮，但是我们可以□种悲悯的、虔诚的情感姿态，来记录这个□时代中那些已经消逝、正在消逝的美好的事物，为未来留下□种记忆、□化、情感、□命，乃□魂灵性的东□。”[7]面对民俗文化凋零的困境，新时代乡土文学主动承担了拯救濒危文化传统与重构现代文化基因的双重使命。王怀宇与刘庆的创作，分别以东北黑土地农耕伦理与萨满精神为支点，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探索文化超越的可能路径。

《唇典》中像李良、满斗这样的萨满，展现的不是什么封建迷信的法力，而是萨满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即一种超越仇恨、对生命本身的巨大悲悯和爱，这才是萨满文化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随着火车、留声机这些现代科技的到来，萨满跳神那一套仪式、像灯官节这样的老民俗看起来是过时，甚至被当成“封建残余”批判，可是萨满文化里那种敬畏自然、珍视生命的根本观念，却依然顽强地留存在人们心里，成为面对历史苦难时的一种精神力量。哪怕战争动乱把传统的家族、乡亲关系都打散了，但像赵柳枝收养敌人的孩子、满斗种“灵魂树”守护家园这种行为，把传统的忠孝观中那种对自家人的责任，升华成了对所有人、对生命共同体的“大爱”，更符合现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满斗“猫眼”失明象征着那种能“通神”的旧时代萨满彻底结束。在小说结尾，库雅拉河谷计划搞旅游，要表演萨满歌舞、做萨满法器，这虽然把传统文化变成了带有商业性质的表演项目，但这可能是让濒临消失的萨满文化“活下来”的一种新方式。就像把老物件放进博物馆展览，虽然不再是原来的用途，但它的价值和精神得以被看见、被传承。

在刘庆和王怀宇的作品中，中华文化的新生不在“复古”或“西化”，而在传统基因与现代元素的创新性融合，比如黑土地孕育的“金稻粳米”，既包含了老叔的种植哲学，也具有现代化的ISO有机认证标准；库雅拉河谷的萨满展演，既存续了流传千年的古老神话，也吸纳了文旅产业的消费逻辑。

在“新山乡巨变”的书写中，刘庆和王怀宇的作品展现了更深层的文化建构意义。他们不仅关注如何拯救濒危的乡村文化，更着力探索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中的新出路。王怀宇笔下盐碱地变良田的奇迹，象征着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再生；刘庆塑造的满斗在推土机旁种下“灵魂树”，则是对精神根脉的顽强守护。这些乡土叙事共同揭示了，当赵二良用画笔记录农耕文明，满斗凭借失明的猫眼洞悉历史真相时，乡土文学便成为重述中国道路的史诗载体，其核心价值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链并未断裂，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催生出既延续传统根脉、又承载人类共同价值的新文明形态，为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中国方案。

4. 结语

在“新山乡巨变”的背景下，王怀宇与刘庆的创作以文学之力完成了对乡土文明新质的论述，他们通过赵二良的现代技术实践与满斗的精神根脉延续，破解了乡村发展中“革新”与“延续”的对立，而从盐碱地稻浪的重生到“灵魂树”生态扎根的书写，则昭示了绿水青山作为文明延续的伦理基石，更以萨满精神的生命大爱、农耕“良心”哲学，推动传统文化基因在变化中孕育出兼具民族根性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新文明形态。这些东北叙事以黑土地上翻涌的稻浪与萨满鼓点化的文旅节拍，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乡土文明在根脉不绝中创新求变的复兴路径，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饱含文学智慧的精神方案。

基金项目

本文为长春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须在期刊中显示项目名称编号。项目名称：“新山乡巨变”背景下吉林乡土小说创作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24145）

参考文献

- [1] 王干.为何现在的小说难见风景描写[N].光明日报, 2022-04-13(14).
- [2] 王怀宇.芬芳大地[M].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22.
- [3] 王怀宇.风吹稻浪[M].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1.
- [4] 刘庆.唇典[M].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 [5] 田振华.论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的“新山乡巨变”书写 [J].当代文坛, 2023(4).
- [6] 王怀宇.血色草原 [M].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21.
- [7] 张丽军.书写新□乡巨变经典: 传承千年乡村根性□化 [J].文艺论坛, 2022(5).